

## 再论题元、论元和语法功能项 ——评“格标效应与语言差异”

冯 奇, 万 华

(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44)

**摘要:** 通过简要回顾格标效应的工作原理, 可以重新对比分析英汉两种语言语法功能项在静态逻辑和延伸变异条件下的组配关系。继续观察表明英汉语言功能项的赋格允准和题元释放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差异实际上是研究者定义模糊和研究方法不当所致。因没有采用统一的标准对待两种语言的各种搭配现象, 单向强化汉语中不符合静态逻辑的非典型组合关系, 格标效应无法解释英语中众多不按动核指派的题元释放的通例。因此英汉题元实现只有参数上的差异而没有原则上的差异。对比研究应该遵循典型对典型, 变异对变异, 而不是典型对变异的原则, 对语言事实的认定不能简单地以点推到面。

**关键词:** 题元; 论元; 主语; 宾语; 原则; 参数

**中图分类号:** H3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7-6522(2008)03-0150-07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3期刊登了胡建华先生的《题元、论元和语法功能项——格标效应与语言差异》一文(下称胡文)。该文对汉语和英语等语言题元角色和论元结构的制约和实现差异有诸多新的提法, 但未尽之言甚多。由于题元角色和论元结构是句法研究中的核心概念, 格标理论涉及到语法关系项的静态逻辑语义制约、题元和论元实现以及语言类型定位等一系列语言学原则性问题, 且胡文的观点在学术界有一定的代表性, 因此有必要对该问题作进一步讨论。我们拟从原则与参数、语言类型与历时发展等几个方面, 谈谈自己对题元、论元和语法功能项等概念及其运作的一些粗浅看法, 希望本文能够激发更多的思考和讨论, 以加深我们对语言运作和语言学原理的认识, 并得到更加可靠的结论。

胡文开宗明义地指出:“在现代汉语中, 主宾语在句子中的实现似乎不仅不受动词题元角色选择限制, 而且也不受论元结构的制约。”<sup>[1]163</sup> 胡文用来论证其观点的主要例子是:

- (1) 写毛笔; 捆绳子; 吃大碗; 吃食堂
- (2) a. 这瓶酒喝醉了老王。  
b. 这瓶酒醉得我站不起来。
- (3) a. 跑博士点。  
b. 王冕死了父亲。

胡先生解释说:“在(1)中, 动词宾语并不符合动词的题元选择要求。”即, “动词后作为结构宾语的占位并不对应于动词给常规宾语指派的题元角色; 比如在‘吃大碗’中, ‘大碗’并不是动词‘吃’的对象”。“在

收稿日期: 2007-11-13

作者简介: 冯 奇(1960- ), 男, 江西临川人, 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副院长, 教授。

(2)中,动词前作为主语的占位成分也不是动词喝的动结复合词‘喝醉’的施事。”“在(3)中,动词‘跑’和‘死’都是不及物动词,应该只带一个论元,但(3)中这两个不及物动词都可以带宾语,似乎是凭空多出了一个论元。”“现代汉语主宾语在论元结构和NP的题元角色选择上所享有的这种自由度不仅英语没有,就是与汉语在许多方面相近的日语和韩语也不具备。”<sup>[1]163</sup>因此有必要区分格标语言和非格标语言两大语言类型。胡文用来归类的格标效应是:

A. 格标语言:(a)所有的NP都必须有格;(b)动词题元必须释放,有格NP通过占据题元位置( $\theta$ -position)得到题元标记( $\theta$ -marking);(c)有题元标记的NP才可以做论元。

B. 非格标语言:(a)NP可以无格;(b)动词题元可以不按常规释放,NP可以不通过占据题元位置获得题元;(c)不占据题元位置的NP可以不是论元。<sup>[1]165</sup>

因汉语题元在三组例子中均未按常规释放,故汉语的NP可以不通过题元位置来获得题元,主宾语也就可以不是论元。胡文最后指出:“在格标语中,NP的允准和解读并不完全取决于句法,而是由句法—语义—语用接口机制来决定。”<sup>[1]167</sup>

胡文的研究目的似想为汉语建立一个独立于题元角色和论元结构的解释模式,从而取消论元和题元必须依赖于动核的静态逻辑意义来实现的理论基础。但问题是,汉语中的这三组问题在英语中的情况如何?代表格标语的英语和代表非格标语的汉语在这三个焦点问题上的差异显著性程度如何?区分格标语和非格标语的主要理论建树在哪里?对语言事实的认定应以什么为基础,对比研究应遵循哪些原则?

## 二

格标效应的讨论可归纳为句法研究中需要论证的三个焦点问题:(1)题元指派偏差,(2)题元角色异位,(3)论元数量溢出。根据语义关系和当代语言学对这些关系的一般认识,汉语主宾位上的论元和题元实现呈多样化趋势。如,在吃水果(受事),吃火锅(工具),吃食堂(处所),吃包伙(方式),吃劳保(依据),吃老李(对象)中,<sup>[2][3][4]</sup>除“水果”外,其他宾语都没有按动词指派的静态逻辑关系实现。在现代汉语中,有时主宾换位可保持命题意义基本不变,例如,“十个人吃一锅饭”和“一锅饭吃十个人”。因此,研究者往往要在高于词汇概念意义的更抽象层面上来寻求答案。陆俭明、<sup>[5][6]</sup>石毓智<sup>[7]410</sup>都曾采用“容纳关系”给予解释。现代汉语一元动词有能力带两个论元的现象也完全符合汉语事实,张伯江、<sup>[8]</sup>王占华、<sup>[9]</sup>沈阳、<sup>[10]</sup>文炼、胡附<sup>[11]</sup>等都曾做过不同程度的讨论。

然而,只要充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不按照静态逻辑语义关系来组织句法结构是语言的通例,并不是汉语的特例。英语中虽不允许 eat a big bowl、write a writing brush、fly Shanghai 的搭配形式,但却允许 write me、kiss goodbye / good night、walk the dog、talk sense、stay the night、sit an exam 等搭配形式,它们在组合中都没有按动词指派的题元角色释放。我们完全可以问,动词之后的名词或代词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再引入复杂结构,那么这种关系的错位就更加显著。Fillmore<sup>[12]</sup>观察到以下组合现象:

(4) a. John smeared paint on the wall. / John smeared the wall with paint.

b. John planted peas and corn in his garden. / John planted his garden with peas and corns.

显然,paint不是smear的对象,garden也不是plant的对象,但它们却是英语允准的宾语。英语中违反静态逻辑语义而成为合格搭配的现象不是个例而是通例。仅Fillmore的举例就还包括 He loaded bricks onto the truck. / He loaded the truck with bricks. He sprayed paint on the wall. / He sprayed the wall with paint. 等。<sup>[13]165[14]</sup>Goldberg也多次提到过类似用法,<sup>[15]2,7</sup>并对load和spray的用法作了专门的论述。<sup>[16]36</sup>这种例子似乎无法尽举,类似的例子还有 sneeze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sup>[15]9,31</sup> She filled the water into the cup, She poured the cup with water,<sup>[16]35</sup> strike a stick against the wall, I can drink you under the table, He will talk her into / out of it, She slept the champagne off 等等。用Goldberg的话说,这是“题元含混”(thematic ambiguity)。<sup>[15]18</sup>格标效应无法解释作为格标语的英语为何也大量允许题元角色偏差。

关于汉语中施受角色主宾位对换而命题意义保持不变的句法现象,学术界较为普遍的观点是这类句式为汉语独有。事实上,英语中类似现象并非缺失。Fillmore在讨论句子主语和宾语关系时举了好几个

类似的例子，<sup>[13]169-170</sup> sleep 对功能项的句法调整就是一例：

(5) This houseboat sleeps eight adults or sixteen children.

按照静态逻辑，sleep 的主语应该是具有行为活动能力的名词，起码应该包含 [+animate] 的义素。但受焦点转移作用的影响，方所名词却能成为主语，而符合静态逻辑语义的施事则变成了宾语。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 也举了一个类似的例子：Our house at the beach sleeps six comfortably.

继续观察还会发现更多的语例。根据英语语法，我们可以说，The bees are swarming in the garden / The garden is swarming with bees, This stream abounds in fish / Fish abounds in this stream, The place is crawling with Indians / Indians are crawling in this place, The tap is running with water / Water is running from the tap, Her face was streaming with tears now / Tears are streaming down her face, His hand was trickling down with blood / Blood was trickling down his hand, The table was piled with books / Books are piled on the table 等等都是合格组合。<sup>[17]</sup> 这一系列施受关系换位的例子说明，“主语轮流坐庄”<sup>[17]26</sup> 在英语中也同样普遍。如果说英语的变位引发了意义的变化，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汉语的变位也引发了意义的变化。这就是 Goldberg 的“无同义原则”(Principle of No Synonymy)，即“如果两个构式在句法上不同，那么它们在语义上或语用上也必定不同”。<sup>[15]3,67</sup>

胡文还以“我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在英语中没有 I this problem cannot solve 的对应组合方式和汉语“推[他]向深渊、推向深渊他、推向他深渊”中的“他”无法放到动词之后等作为否定汉语格标性的证据。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决定格标语性质的标准一定是英语结构，而不是题元释放本身；在我们看来，这些恰恰是题元得到释放的好例子，至于向左释放还是向右释放不是能否释放的本质问题。“推[他]向深渊”的汉语完整表达应该是“把字句”和“将字句”。左向释放无非是汉语组织信息的一种方式而已，看不出它在题元释放能力上有什么劣势。如果一定要用功能项在动词的前后位置来确定格标语的地位，那么又如何解释 This problem I cannot solve 的合格性以及英语中的一系列倒装句，我们又将如何认定日语、德语和俄语的格标地位，格标效应将带来一系列理论上无法调和的矛盾。至于“张三追累了李四”的题元释放和多种解读，我们完全可以从结构歧义和语义指向中寻找答案。英语对应动词(如 pursue)中找不到类似的歧义结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英语中是否也允许结构歧义和多种释放。Chomsky 在解释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关系时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6) I had a book stolen.<sup>[18]21</sup>

在 Chomsky 看来，这个句子起码允许三种理解：(i) I had a book stolen from my car when I stupidly left window open, 即 someone stole a book from my car; (ii) I had a book from his library by a professional thief who I hired to do the job, 即 I had someone steal a book; (iii) I almost had a book stolen, but they caught me leaving the library with it, 即 I had almost succeeded in stealing a book。<sup>[18]22</sup> 可见，英语“steal”的施事题元角色释放也呈多样化。

我们认为，相同表层结构的歧义是由句子的不同深层生成路径提供的。它造成了多个可能的解读。结构歧义在各种语言中都普遍存在。不明白这一点，就会形成错觉，“觉得汉语是一种不精确的语言，其实并非如此”。<sup>[7]406</sup> 我们不能因为汉语某个双指向动词在英语中找不到对应就认定汉语缺乏逻辑规律。至于英语和汉语在具体词语组合上的差异，那是不同语言之间局部性的参数问题，而不是语义是否能够合理释放的原则问题。可以说，语义结构是任何一种语言建立和运行的基础。克服偏见是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胡文的第三个问题是现代汉语凭空多了一个论元。我们不妨回顾前文所引 Goldberg 的 sneeze the napkin off the table 等用例。我们同样可以问 sneeze 是一价动词还是二价动词？如果是一价，那么怎么多出一个宾语；如果是二价，那么为什么 sneeze 又不能单独与 the napkin 连用？Langacker 指出，英语中有许多既是不及物又是及物的动词：break、melt、starve、burn、freeze、drive、teach、learn、drink、eat、kick 等，动词的多重组配行为说明，兼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语言经济原则的必然结果。<sup>[19]</sup> 最经典的莫过于 Goldberg<sup>[15]10,55</sup> 转引 Levin & Rapoport<sup>[20]</sup> 的一个例子：

(7) Paulin smiled her thanks.

例证很好地说明了不及物动词 *sneeze* 和 *smile* 并没有因其特殊的组合方式而引申出及物的义项,动词的及物性是在构式的命题意义中获得的。换句话说,特定句法形式表达的特定意义不能只归因于句子中词汇本身(尤其是动词)的意义。毕竟,“sneeze”并没有因此而可以增设“X causes Y to go to Z by sneezing”的语法功能意义和词汇概念意义。既然如此,smile 之后的 thanks 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凭空多出,那么如何解释格标语题元释放问题?Goldberg 将此称作“角色数量失配”(mismatches in the number of roles)。<sup>[15]53</sup>

英语虽然不能用 *run a doctoral program* 作为“跑博士点”的对应表达方式,但该搭配本身是成立的,只不过不表示“跑博士点”的意思而已。此外,我们还能说 *run the entire distance*、*run the mile*、*run errands*、*run one's rounds*、*run a race*、*run two horses*、*run candidates*、*run the streets*、*run the machine*、*run extra trains / ferries*、*run the cows* 等等。如果说英语的“run”对应于汉语的“跑”,那么为什么英语允许多种搭配是题元释放而汉语不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英语发展出了不同的义项,是变异用法或一词多义的结果,那么为什么汉语的“跑博士点”不可以看作是一种基于典型用法的变异或多义的结果?

关于汉语的“跑”,《汉语大词典》列出了以下 6 个义项,或许有助于解答我们的问题。跑:1 奔,急走;2 逃,逃走;3 走,走路;4 为某种事物或利益而奔走;5 丢掉,失去;6 量词:古代计踢球的回合数。关于“吃”,《汉语大词典》提供的义项就更多,共 15 个:1 把食物放入嘴中经咀嚼咽下;2 饮,喝;3 吸,吸收;4 承受,经受;5 犹跌;6 隐瞒;7 赌博用语:指收取赌注;8 弈棋用语:指除去对方的棋子;9 军事比喻消灭敌人;10 指在某一出售食物的地方吃;参见“吃食堂”、“吃馆子”;11 指依赖某种食物来生活;12 欺压;13 用,费;14 介词:被,让;15 连词:因为,由于。

可见和英语一样,汉语在原生意基础上派生出了多个义项。至此,我们还能说“吃大碗”、“吃食堂”、“跑博点”不是题元和论元了吗?我们是否还要坚持认为“格在现代汉语中的存在很难从经验和理论上验证”<sup>[1]165</sup>呢?如果再考虑英语的 SVOO 结构,那么问题就更多了。英语二价动词的变异似乎比汉语的自由度还要大。Goldberg 给出大量例子,如 *Sally baked her sister a cake*, *Joe painted Sally a picture*, *Bob told Joe a story*, *His company promised him a raise*, *The orchestra played us the symphony*, *She wired Jo a message*, *She quoted Jo a passage*, *He owes you many favors*, *She blew him a kiss*, *She shot him a keep-quiet look*, 等等。<sup>[15]141-149</sup>其目的就是要解释英语动词为什么不按题元角色和论元结构释放的问题。我们不知道格标效应将如何解释这些凭空多出来的论元以及格标与非格标的区别性特征在哪里。格标效应显然仅仅是参数上的操作,在原则上很难说得通。胡文最大的问题是未使用统一的标准,在评判汉语时刻意寻找特例,单向强化汉语中不符合静态逻辑的非典型组合关系,此后又以这些特例在“格标语”的英语中不能直接对应为依据确定汉语为“非格标语”,这是因没有严格定义语言而导致的不公平对比。辩证地看,英语中论元和题元实现也会偏离静态逻辑。将英语中的特例译成汉语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汉语也有比英语更符合逻辑的组合方式,如我们不能说“张三微笑他的谢谢”。这时我们是否又该交换英汉的格标语和非格标语的标签呢?

胡文最后两个值得商榷的例子是“他们,你看我,我看你”和“水果,香蕉最好吃”的组合方式。从核心句的定义出发,前件的“他们”和“水果”皆不是核心功能项。前一句含两个小句,“看”的主语和宾语不是“他们”,而是“你”和“我”,故无法给“他们”指派题元;“最好吃”的主语也不是“水果”,而是“香蕉”。既然“他们”和“水果”都不是动核的必有论元,所以不涉及题元释放问题。从这个角度看,胡文将释放和实现的因果关系弄错了。其实英语中也存在类似的结构:

(8) Age, I do abhor thee;

Youth, I do adore thee. (W. Shakespeare: A Madrigal)

(9) Citizens of the world's richest and most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nations, many of them will find it increasingly painful to keep up with the incessant demand for change that characterizes our time. (A. Toffler: Future Shock)

我们不知道格标理论如何解释 *age* 和 *youth* 以及 *citizens* 和 *many of them* 的题元角色问题。当然不是说一定不能有的说法。如何判断这两个前件成分是我们避不开的问题。语法界有借用语用学术语

“话题”的提法。因超出了核心句的核心范畴,我们将另撰文讨论。

汉语语法经历了长期缓慢的演变,由于类化作用,词序越来越规整,规律性也越来越完善。构式语法认为,构式具有承继性(inheritance),<sup>[15]72-73</sup>即一个动词的某种构式能够传承给体系中许多其他动词,从而带来一系列组合关系的理据性变化。承继性促使语言中各种句式的形成。这就应了朱德熙曾说过的话:“语法可以类推,而词汇不能类推。”虽然“语法又不能毫无限制地类推”。<sup>[21]</sup>我们认为,汉语允许某些结构并不意味着英语也必须有同样的结构,反之亦然。“同是人类的语言必有相似之处”,<sup>[22]326</sup>但语言与语言之间的“文法是独立的,非模仿的”。<sup>[22]333</sup>这就牵涉到对比的层次。分类的层次越高,语言的共性越大;相反,分类的层次越低,语言的差异越大。在参数层次上谈论原则问题是得不出正确答案的。胡文在选择语料时将符合静态逻辑要求的那部分例证分配给了英语,而将不完全符合静态语言条件的组合方式分配给了汉语,以此作为格标语和非格标语的依据。其实,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动词是及物还是不及物在认知上是一个识解(construal)问题。对以汉语为母语的人而言,“去”和“等”多被看作是及物动词,而英语的 go 和 wait 多用于不及物。孰是孰非并没有太多的理据。毕竟理据性和任意性是语言中两条并行不悖的原则。由于识解的不同,两种语言切分概念的方式也就不会尽同,但这只能是参数。

### 三

胡文的主要观点是“对语言事实的认定,可以从点推到面,但不可以从无推到有”。<sup>[1]165</sup>其具体做法是通过英语代词点上的形态格变事实推出名词面上也有主宾格位的假设。根据这条假设,由于汉语没有任何点上的形态依据,故属于非格标语。也正是由于英语符合这一假设条件,故它是格标语。

我们同意胡文“不可从无推到有”的观点,但不同意“可以从点推到面”的说法,因为根据辩证法的原理,只有当点上的特征为面上的所有成员所共同拥有时该观点才能够成立,否则就有可能犯过分概括或以偏概全的错误。“盲人摸象”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的正是这个道理。既然以现代英语为观察对象,就必须以现代英语的事实为依据,但可以佐以古英语例证,在历时过程的参照中看到它的发展轨迹。

当然,对语言事实的认定都从点开始。代词形态标记是一个观察点,但名词形态无标记也是一个观察点,排列顺序还是一个点。然而点上的特征必须接受面上的普遍性验证。刘润清在谈到语言科学观时指出,语言学理论须遵循“客观性、系统性和清晰性”三条基本原则,并将客观性视为第一条原则。<sup>[23]</sup>所谓客观性即不能先入为主,或者说“语言数据要相当多,有足够的代表性;不可依靠少量的语言事实就得出很概括的结论”。当不同点上的观察结果发生冲突时,就应依据事实属性的拥有程度来确定取舍。说到底就是要个例服从通例,少数服从多数,然后再对少数的个例现象作出进一步解释,这是科学研究的一般步骤。和代词相比,名词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英语名词有无格位根本用不着通过代词的形态标记得验证,因为接下来的一系列论证工作依然是动词和受它支配的名词间的逻辑关系来确定它们的句法功能关系。众所周知,汉语主要依赖语序表示句法关系义。当代语言学倾向认为,语序是广义形态的表现形式。据此,以汉语没有形态上的依据来否定汉语格的做法似乎欠妥。更重要的是,以语序为主要表义手段也是现代英语的语言事实。

规范与例外在历史条件下是可以互换的。从亲缘关系上看,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英语和汉语相去甚远。自19世纪初 Wilhelm von Humboldt 提出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粘着语(agglutinating language)和屈折语(inflecting language)以及 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 提出分析语(analytic language)和综合语(synthetic language)以来,<sup>[24]</sup>历时语言学家对语言类型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语言类型学研究表明,曾几何时古英语名词的格是一套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曾经是高度屈折化语言,有点类似拉丁语”。<sup>[25]127</sup>古英语名词共有五个格,即主格(nominative)、宾格(accusative)、生格(genitive case)、与格(dative case)和工具格(instrumental case),分别表示主语、宾语、间宾和中介等语法意义关系。这种区分捕捉到了英语与汉语的本质性差异,因此分类成立。但就组合方式而言,“现代英语具有很高程度的孤立语特征:如 You must have been sitting in front of the TV for hours;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find a more interesting book than this one”。<sup>[25]127-128</sup>都是通过组合排序表义的。“现在已经相当清楚,只要有足

够的时间,一种语言就能够从一种类型转变成另一种类型:孤立语能够通过复合的方式发展成粘着语,而粘着语也可以通过复杂的音位变化发展成屈折语。”用 Henry Sweet(1874)的话说,在长达 1500 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英语经历了从完全屈折(full inflections)到屈折削弱(levelled inflections)再到屈折脱落(lost inflections)三个阶段,由综合语向分析语演变。<sup>[26]</sup>代词中保留格的形态变化乃是古英语在现代英语中的残余,这种残余在其他词类及其组合方式中也留下一些痕迹,比如 alive、aflame、afoot 等一些在句子中只用作表语的形容词都与古英语名词的与格直接相关。而今我们再也无法按照古英语的规则来分析它们在现代英语中的作用了。就像地质学家能够从山丘的地层结构中找到海洋生物残余一样,这些残余只能作为过去的状态的依据,而不能作为山丘的依据。以现代英语事实为依托,与其以有标代词的点为据,不如以覆盖面最广的语序为据,语序能够更合理地说明词语的组合关系,因为无论是无形态变化的名词还是有形态变化的代词,它们的句法实现都普遍依赖于语序。

胡文在结束语中借用了 Chomsky 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结论。然而 Chomsky 的理论只关心“在一个完全同质的语言社团内,一个理想的说话人一听说话人具有的完备语言知识”。<sup>[18]3</sup> 他的理论不是为解释特殊现象设计的。为了做到理论对内的一致性与对外的排他性,生成语法对解释超越选择限制(selectional restriction)范围的语料不感兴趣。桂诗春说得很明白:生成语法只注意连续统中自由组合的一端,有一半语言现象得不到探索和解释。<sup>[27]</sup>也正因为如此,他的理论在中国既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在国外也是如此。用 Chomsky 的理论作为区分格标差异的依据,恐怕 Chomsky 本人也不会同意。

#### 四

语言研究可以侧重静态逻辑,也可以将范围扩大到变异现象。如何定义语言的概念范围是自 Plato 和 Aristotle 始就一直争论不休的哲学话题。研究者的语言观决定了他的研究方法。出于理论体系的内部一致性要求,历代学者都会自觉地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作出选择,但语言观的选择不能在对比中疆界失守。这就要求研究者客观公平地对待处于对比中的语言现象,用通例对通例,特例对特例,或动态对动态,静态对静态,但却不能用通例对特例,静态对动态。选用一种语言中符合严格静态条件的现象去评判另一种语言中不符合这种条件的现象是任何对比研究都无法接受的。应该承认不同的民族语言有区别于其他语言的个性,但既然是在题元、论元和格位等原则问题上寻找规律,那么只有系统的本质性差异才能作为区分语言类型的根本依据。我们既不能模糊常规和特例的差异,也不能模糊原则和参数的差异。现代语言学已经认识到理论的建立需要做到三个充分:观察、描写和解释的充分。<sup>[28][29]</sup>这三个充分呈递进关系,只有做到观察的充分才有可能做到描写的充分,只有做到描写的充分,才能做到解释的充分,否则就可能因特设(ad hoc)而出现论据不足,进而使论点的整个论证过程失去基础。进一步观察表明,英语和汉语在胡文提出的三组问题上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作为语言类型学的一部分,建立格标语和非格标语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胡先生最后的结论“在格标语言中,NP 的允准和解读由句法来执行,而在现代汉语中 NP 的允准和解读并不完全取决于句法,而是由句法—语义—语用的接口机制来决定”<sup>[1]167</sup>是不成立的。我们倾向于采取以下观点:在所有语言中 NP 的允准和解读都要受句法、语义、语用,甚至包括韵律<sup>[30][31][32]</sup>以及文化<sup>[33]</sup>等因素的制约。

#### 参考文献:

- [1] 胡建华. 题元、论元和语法功能项——格标效应与语言差异[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7, (3): 163-168.
- [2] 陆俭明.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11-12.
- [3] 徐烈炯, 沈阳. 题元理论与汉语配价问题[C]//沈阳. 配价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 北京:语文出版社, 2000: 1-52.
- [4] 张云秋, 王馥芳. 受事标记过度使用的优选论解释[J]. 外国语, 2005, (3): 22-28.
- [5] 陆俭明. “句式语法”理论与汉语研究[J]. 中国语文, 2004, (5): 412-416.
- [6] Goldberg A E. 构式语法·序[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VI-VII.
- [7] 石毓智. 英汉动词概念结构的差异对其被动表达的影响[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 (6): 403-411.
- [8] 张伯江. 功能语法与汉语研究[J]. 语言科学, 2005, (6): 42-53.
- [9] 沈阳. 逻辑判断基本类型及其在语言中的反映[J]. 当代语言学, 2000, (3): 125-137.

- [10] 王占华. “吃食堂”的认知考察[J].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0, (2): 58-64.
- [11] 文炼, 胡附. 扩大语法研究的视野[C]//吕叔湘, 马庆株, 等. 语法研究入门.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65-68.
- [12] Fillmore C J. The Case for Case[C]//C J Fillmore. Form and Meaning in Language.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2003: 23-122.
- [13] Fillmore C J. Types of Lexical Information[C]//C J Fillmore. Form and Meaning in Language.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2003: 141-172.
- [14] Fillmore C J. The Case for Case Reopened[C]//C J Fillmore. Form and Meaning in Language.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2003: 175-199.
- [15]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16] 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7] 张今. 思想模块假说——我的语言生成观[M]. 郑州: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7: 26-28.
- [18] Chomsky N.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5.
- [19] 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II)[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387.
- [20] Levin B, T Rapoport. Lexical subordination[C]//In Papers from the Twenty-four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s Society. Chicago: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8: 275-289.
- [21] 孙锡信. 我心中一盏不灭的明灯[C]//朱德熙先生纪念文集. 北京: 语文出版社, 1993: 132-136.
- [22] 王力. 中国文法学初探[C]//王力语言学论文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324-374.
- [23] 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5: 3-4.
- [24] 洪堡特. 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M]. 姚小平译.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318.
- [25] Trask R L. Historical Linguistics[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Limited, 2000.
- [26] Sweet H. History of English Sounds[M]. London: Trubner, 1874.
- [27] 桂诗春. 以概率为基础的语言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4, (1): 3-9.
- [28] Chomsky N. Knowledge of Language: Its Nature, Origin and Us[M]. New York: Praeger, 1986.
- [29] Chomsky N. The Minimalist Program[M]. Cambridge: MIT Press, 1995.
- [30] 冯胜利. 汉语的韵律、词法与句法[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 [31] 王洪君. 汉语常用的两种语音构词法[J]. 语言研究, 1994, (1): 65-78.
- [32] 王洪君.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汉语的音系格局与单字音[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33] Jackendoff R. Language, Consciousness, Culture: Essays on Mental Structure[M]. Cambridge: MIT Press, 2007.

### Theta-roles, Arguments, and GF Revisited

#### ——Comments on Case-marking Effects and Language Variations

FENG Qi, WAN Hua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brief review of the working principles of case-marking effect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combinatory relations of grammatical function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tatic logic and extensional deviation. Contrary to what is claimed in Case-marking Effects and Language Variations, further examination indicates that there i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selection and release of grammatical functions between Chinese and English, and the so-called differences are a result of the researcher's unclear definition and inadequate research methodology. Due to the lack of a unified criterion in treating the combinations in both languages and a narrow focus on atypical Chinese combinations that go against static logic, the researcher has failed to see that case-marking effects could hardly explain numerous examples in English where the release of grammatical functions is also not compliant with static logic. Therefore, it might be argued that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lease of grammatical functions in both languages are parametric, rather than principled. It is noteworthy that, while conducting contrastive analysis, researchers should differentiate typical language samples from atypical ones and guard against overgeneralization.

**Key words:** theta-roles; arguments; subject; object; principle; parameter

(责任编辑: 魏 琼)